

文/片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
实习生 冯岩岩 于民星

万印楼里的万件古印

如果不是深入到狭窄的街巷中,很难想像陈介祺故居陈列馆,就在这里。走近才发现,刘海粟先生题写的“万印楼”牌匾就挂在大门上。

陈列馆坐落在潍坊市潍城区芙蓉街北首,大门外的小路上,经常有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经过。而在陈列馆另一侧,一墙之隔则是潍坊三中,学生们在正常上课。

万印楼与十钟山房之间隔着一条窄巷,两层楼高的万印楼与十钟山房,灰砖灰瓦,陈列馆的工作人员巩庆华介绍,从修建至今,只有部分砖瓦换过,其他的都是当年陈介祺修筑的万印楼主体结构。

一百多年前,陈介祺故居占地约一万平方米,房屋百余间,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(公元1850年),直至陈介祺辞官归里数年后方建成,一直由陈氏家族世代居住。新中国成立后潍坊市政府动员陈氏后人迁出,改建为潍坊第三中学。后大部分建筑都被拆除改建了楼房,原建筑物仅存一座两层小楼、三间主屋(祠堂)和三间厅房。后经山东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为了纪念这位著名金石学家,潍坊市政府批准,在此建立了陈介祺故居陈列馆,1993年开放,供人们参观。

万印楼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(公元1850年),当时陈介祺38岁,在翰林院供职,在金石收藏研究上初露锋芒,已有退出政坛,专事金石之念。回潍坊后,这里就成了他收藏研究金石之所。因为它珍藏过万余件文物珍品,故称万印楼。

在这里,陈介祺秉承“意在传古,志在为国”的理念,鉴古、集古、释古、传古,三十年如一日,至死方休,终成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”的一代金石大师,晚清金石界领潮人。

“十钟”也叫“陈氏十钟”,因陈介祺的收藏而得名。是西周和春秋两个时期的青铜钟。名为“十钟”实为十一件。取其整数曰“十钟”,由此陈介祺名其书斋曰“十钟山房”。

山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、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孙敬明介绍,陈介祺的金石收藏品类繁多,数量惊人,且多精品。凡带有古文字与图像的商周秦汉器物都是他涉猎的目标,包括青铜器、玺印、陶文、封泥、铜镜、瓦当、诏量、泉币、画像砖等,尤以战国至两汉官私印为大宗,数量多达七千六百余钮。

因此陈介祺专门修建了“万印楼”来存储这些藏品,陈介祺的收藏,达到了古玺印个人收藏的顶峰,其中被文鼎、龚自珍所珍秘的“健仔姜妾”玉印,也归陈介祺所有。

清光绪九年,经过十多年漫长的钤拓、编次,陈介祺将收集到的何昆玉、潘有为、叶志诜等家旧藏,并荟萃李璋煜、吴式芬、鲍康、李佐贤、吴云、吴大澂等藏家的古印,加以自己藏品,共一万零二百八十四方,以古玺、官印、玉印、套印、两面印、吉语印、图案印等分类,汇辑成《十钟山房印举》,共一百九十九



53.8厘米,口径47.9厘米。圆形,二立耳,深腹外鼓,三蹄足,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,端庄稳重。

毛公鼎由做器人毛公得名,有铭文32行497字,是迄今发现铭文最长的青铜重器,被郭沫若誉为“抵得一篇《尚书》”。毛公鼎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史的重要文物,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,为镇院之宝。陈介祺对其所藏都乐于公诸于众,印成目录昭示天下。唯独毛公鼎,深锁密藏,秘不示人。

孙敬明认为,陈介祺所处的时代,为清朝中后期,这个时候的清王朝,正在走下坡路,末世的景象已经浮现出来,青铜器,在价值上,或许没办法跟珠宝玉石黄金之类的进行比较,但是在一个研究金石的收藏家眼里,毛公鼎不仅仅是一个青铜器,而是被当作历史文献,当成历史信息载体去收藏。

孙敬明认为,与黄金等比

潍县陈氏:

家学渊源 金石传家

是不是一个文化大家族,家族中人官职的大小只是一个方面,而对于文化的传承能够起到的作用则更为重要。

潍县陈氏家族,最为本地人称道的,不是陈家哪个人的官职最高,而是陈家在传承传统文化上的地位。尤其是以陈介祺在金石学上的地位最高。



陈介祺故居陈列馆坐落在潍坊市潍城区芙蓉街北首,门口挂着万印楼的牌子。

四册本。集印之丰,册数之多,也成为印谱史上不可有二的巅峰巨作。

可惜的是,今日的万印楼中,陈介祺的藏品都为复制品,原件多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、台北故宫博物院、青岛博物馆等地。十钟山房中的“陈氏十钟”,存放在日本泉屋博物馆。

陈介祺与毛公鼎

提到陈介祺,不得不说的是他与毛公鼎的缘分。

毛公鼎的发现者并不是陈介祺,而是陕西岐山的村民。后经辗转,才成为陈介祺的收藏品之一。

清咸丰二年(1852年),陈介祺从商人手中购得毛公鼎,并

较,体现不出它的价值,陈介祺收藏毛公鼎秘不示人,更多的是为了传承国脉,文脉,四千年传承一脉。陈介祺,对中华文明而言是一位自觉的继承者、捍卫者。他身上就是一种儒家士大夫那种传承的担当,敢对历史负责任,敢以传承国脉为己任。

在去世前几天,陈介祺还在给别人家的书写序。孙敬明在一个年表里看到,上面写着陈介祺去世前几天还做这个事情,还很关心国家的事情。孙敬明认为陈介祺看着国家民族利益受损,国家威望下跌,陈介祺很焦急。同时看着国家世风日下,王公贵族不办事,陈介祺有种山雨欲来,国家将亡,大厦将倾的感觉。

在这种情况下,陈介祺关心着国家文脉的传承,像毛公鼎这样极具历史价值的收藏品,更要严密收藏。现今,陈介祺故居陈列馆中存放着毛公鼎的复制品和拓文。

官宦之家的 金石文化传承

陈介祺在金石学方面成就巨大,但家中官职最大的并不是他,而是他的父亲陈官俊。

陈官俊历任山西学政、内阁学士、礼部及户部左、右侍郎、兵部尚书、礼部尚书、工部尚书。63岁出任吏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67岁任上书房总师傅。68岁去世,赠太子太保,入贤良祠,溢文悫公。

陈官俊曾为道光帝师、长子师,饱读诗书,持身端正,学识渊博,德高望重。陈介祺自幼在书香门第陶冶,深受父亲言传身教,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业。同时,目睹其父宦海沉浮,也决定了陈介祺的志向不能以从政为宿求。

陈介祺后人陈进介绍,陈介祺辞官回故里后,曾为其子孙立下三条规矩,一不许做官,二不许经商,三不许念佛教,希望后辈能安分守己做学问。

陈介祺避祸回到潍县,尽管脱离了京师,但是他当年在

京师有很多好友。虽然是在避祸,但是他对金石学的研究和热忱一点都不减,全是靠书信来联系,一天要写六七封信。

孙敬明认为陈介祺也这样想,尽管国家处在困难之中,但是我要弘扬国家传统历史文化,这就像儒家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万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
要有担当的意识。孙敬明认为,古代文人的心胸很高大,这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,陈氏家族,从这方面来说,他们奋发向上,把国家个民族的利益作为首位,而且把传承文化,弘扬民族传统的事情作为自己所担当的责任,包括后来的陈秉忱、陈继揆无不是秉承这样一种家风做起来的。

孙敬明介绍,陈介祺的四世孙陈秉忱,做过毛主席的学术秘书,毛主席有什么典故有什么问题就问他,毛主席的诗词,书签就是陈秉忱提的。当年中苏友好协定签订的时候,跟斯大林签订的协定,俄文的两份,中文的两份,中文这两份就是陈秉忱写的。

陈介祺的五世孙陈君藻,就是一位篆刻家、书法家,曾经给段祺瑞、吴佩孚等人刻了很多的印,还有宋庆龄、钱嘉应等人。

孙敬明介绍,陈介祺的六世孙陈继揆,是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馆长,历史系的党支部书记,活到80多岁,后来他就整理祖上的学问,整理的陈介祺的众多学术著作。

在孙敬明看来,陈氏家族按传承学来说应该是一个金石学的世家,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,像陈介祺六代相传,辗转相接,父子兄弟研究金石学一门,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,而且陈介祺本身的收藏量在全国也是第一家。

孙敬明认为,陈介祺收藏的东西是富藏精鉴,宗仰海内外,为天下人敬仰。陈介祺的七世孙陈进,现在还在继续传承家学,弘扬家学,他现在整理了很多陈介祺的东西,陈进这么做,也是秉承祖上的遗德。

上接B01版

北大信息与服务系统系主任石宇良说,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媒体格局和社会生活重大变化,正是基于这一背景,中央领导多次对新媒体发展作出部署。但本次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则转向人,首次提到了“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”。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在净化网络空间、弘扬主旋律方面展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石宇良表示,鉴于新媒体的发展趋势,重点团结“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”其实也是统战部门的常规性、基础性工作。

新思路

就在中央统战部近期组织的研究班上,三分之一的学员来自于新媒体领域,包括《凤凰周刊》前记者邓飞、小米科技副总裁陈彤、“今日头条”CEO张一鸣、百度副总裁朱光、爱奇艺CEO龚宇、优酷土豆集团副总裁陈丹青、天涯社区副总裁马娜和欧阳后增等新媒体从业人员和“网络大V”。

邓飞因组织公益活动帮助农村儿童等成名于网络,他在新浪微博上拥有500万粉丝。

这是中央统战部第一次将新媒体从业人员成规模地纳入。

邓飞参加的培训班全名为“第12期新的社会主义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”,由中央统战部组织,共55位学员。

据中央统战部网站报道,学员构成有新变化。研究班以新媒体、互联网领域人员为重点,研究班学员“新媒体及互联网领域人员、专业人士、民营科技企业人员各占三分之一”。

授课人与授课课程也具有高规格。授课人则是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齐续春、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等。

根据中央统战部主管的《中国统一战线杂志》报道,已知的培训课程有《当前的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》、《关于中国传统“士”的解读》、《关于新的社会阶层的几个问题》等。

这次培训课还设计交流探讨与实地考察环节。据邓飞介绍,每天晚上固定做分享。邓飞则分享他的公益路程。

就在“五一”期间,学员们还到古田实地考察,参观了古田会议旧址。

根据《中国统一战线杂志》披露,根据学员填写的教学质量评估表统计,对本期培训班的整体满意率达到100%,其中94%的学员表示“非常满意”,并称赞统战工作“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”。

邓飞对北青报记者描述,“当年的共产党人就是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得到了那么多的支持,即便是古田这么偏僻的地区也能星火燎原”。

这种较易让人接受的研究班模式,仅仅是统战工作新思路的一小部分。

刚刚施行的《条例》,还第一次对各级党委(党组)做好统战工作的职责作出全面规定,明确党委(党组)主要负责人是统战工作的第一责任人,党委(党组)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参加统一战线重要活动,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。

溯源历史,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法宝,这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。改革开放以后,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曾公开表示:统一战线是中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。

习近平在此次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成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,拓展了统一战线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。

值得注意的是,《条例》将“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”写入统一战线性质。有媒体指出,统战工作的新变化,注定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。

资料链接

陈继揆发现

“东史郎日记案”证据

据新华社1998年12月26日报道,天津收藏家陈继揆从自己收藏的历史地图中,为败诉的“东史郎日记案”查出证据,证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,南京高等法院门前确有水坑存在。

曾是日本侵华士兵的东史郎在日记里对南京大屠杀有这样一段记载:在南京高等法院门前,“原上官即桥本,向被装进邮局用的麻袋中的中国人浇上汽油,捆上手榴弹,点着扔进水里”。东京法认为,当时的南京高等法院门前不存在水坑。水坑存在与否成为此案的焦点之一。

时年77岁的陈继揆曾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,他一直关注此案。他从自己收藏的上千张历史地图中,找到一张1935年9月由武昌亚新地学社发行的“新南京市实测详图”。天津师大地理系副教授高秀林看完这张图介绍说,从这张比例尺为1:1.8万的地图中可以看出,南京市高等法院门前有三个大小不等的水坑,大约分别为2200平方米、1500平方米和800平方米。这三个水坑距高等法院最近点100米左右,最远点300米左右。

陈继揆出身收藏世家,目前他手中有日军侵略中国时手绘的天津地区军事地图多张。